

鲁西奇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的 空间结构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中原道路、

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与沙漠绿洲道路等

五种区域性历史发展基本道路。

人类社会历史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

同时参与所处空间的建构，人类的活动受到空间的规定。

这一规定呈现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和规范。

我所理解的「中国历史」，是发生在「中国」

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于其间的

各地区人群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

「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

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

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

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历史。

鲁西奇 著

中国历史的 空间结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 鲁西奇著. —桂林: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633-8770-0

I . ①中… II . ①鲁… III .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061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33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空间与历史：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代序）	1
一 “空间”的力量及其意义	1
二 “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	7
三 核心与边缘：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与“内地的边缘”.....	11
四 村落与城市：传统中国乡村聚落与城市的形态和空间结构	17
五 多元、统一的中国是如何可能的？.....	23

卷一 区域多样性

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	35
一 景观多样性	35
二 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	45
三 区域多样性的方法论意义	58
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	72
一 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	73
二 适应、抉择与互动：历史道路区域性差异的形成	93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地带及其变动.....	110
一 三大经济带格局的形成.....	111
二 三大经济地带的变动.....	121
三 影响地带性差异之形成及其变动的诸因素.....	133

卷二 核心与边缘

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	143
一 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	143
二 “核心区”概念的重新界定.....	151
三 不同层级的核心区与王朝国家的地方控制方式	159

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	175
一 秦汉时期的核心区及其转移：从关中到“三河”	176
二 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关陇、河东与河洛	180
三 六朝及南唐、南宋的核心区：宁镇与江淮.....	186
四 中晚唐五代与北宋的核心区：汴洛与河北.....	190
五 辽金元三朝的核心区：从草原到燕地.....	199
六 明清两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南北直隶与畿辅	204

七 结语	211
“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231	
一 隅地、蛮荒以及帝国疆域内部的“化外之区”.....	232
二 “内地的边缘”的区域特征.....	238
三 “内地的边缘”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	251
“边缘”的“核心”：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形成与扩散	
一 问题之提出：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结构性特点	266
二 明清时期的鄂西北地区：“异端的渊薮”.....	273
三 清中期鄂西北白莲教传播的“核心区”及其“核心集团”.....	278
四 跳跃式传播：“襄阳教团”的扩散及其方式.....	299
五 边缘区域内边缘人群中“核心集团”的凝聚与分散	307

卷三 城市与村庄

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 城市：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工具.....	325

二 城墙：威权的象征	330
三 城墙内外：城市的空间分划及其意义	333
四 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研究理路	338
城墙内的城市？——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再思考	
.....	348
一 问题之提出	348
二 城墙之有无	351
三 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358
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一 问题之提出	374
二 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378
三 南方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	389
四 从散村到集村：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演变的总体趋势	398
五 散居与聚居形态下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方式的差异	409
主要征引文献	
后记	426
后记	469

图目

- | | |
|-------------------------------|-----|
| 图 1. 汉代的经济区划..... | 117 |
| 图 2. 隋代的经济区划..... | 125 |
| 图 3. 秦汉时期的核心区及其变动..... | 180 |
| 图 4. 十六国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 | 184 |
| 图 5. 六朝政权的核心区..... | 190 |
| 图 6. 中晚唐五代北宋的核心区..... | 198 |
| 图 7. 辽金元政权的核心区 | 204 |
| 图 8. 明朝与清朝的核心区 | 210 |
| 图 9. 清乾隆后期白莲教“襄阳教团”的核心区 | 298 |

空间与历史：空间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代序）

一 “空间”的力量及其意义

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学考察世界的独特视角的话，空间就是地理学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显然，因为世界的所有表象乃至其本体都处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下，所以，历史与地理就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核心，时间与空间的观察视角与分析方法也就是认知世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学问都是“历史地理学”，或至少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因为几乎所有学问研究的对象都在时间与空间里，而其研究方法也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方法。

时间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咿呀学语的孩童，一天天长大，然后结婚生子，成就自己的事业，这是时间的赐予；人类从匍匐在大自然面前瑟瑟发抖、无可奈何的原始人群，成长为可以较大程度地利用自然、控制自然的高智能群体，这一过程是在时间里完成的。同样，时间让我们忘却悲伤和屈辱，抚平身体与心

灵的创伤；时间让无恶不作、不可一世的权贵与富豪终究成为一堆白骨，让铁骨铮铮、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在记忆与传说中永生，让荣华富贵和穷困潦倒都随风飘去。凡此，都是时间的伟力。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有可记忆的时间，我们才能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并给自己的“今天”下定义；正是因为有可记录的时间，人类才会有可供建立有序与结构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时间，人类的知识才得以累积，并逐步形成越来越庞大但仍然有序的知识体系。毫无疑问，时间塑造了人类和我们每一个人，给人类和我们自己以一个“身份”和界定，使我们拥有可赖以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并给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先验架构”。

那么，空间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或者说，空间是怎样拥有并展现自己的力量的呢？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没有桌椅的教室里（即在每个方向都一样的平面内），老师任意选择一个位置，学生散立周围，以便看到老师，并听到老师的讲话；他们的排列易形成半圆形，成排地面对老师，而且是密度很高地靠近老师。在这里，老师与同学们组成一个“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区位”），人与人之间存在“距离”，每个人的的目光都指向一定的“方向”，并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内在“关联”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老师的“位置”构成了空间的中心，学生们自然而然地面向老师，形成向心性，从而在空间感觉上强化了老师的中心性和权威。这就是“位置”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个世界的某一特定位置上（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位置），这个位置至少在最初是先于我们而存在的，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

和机会，同时也界定、制约或影响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比如：一个秦巴山地山谷村庄里的少年，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机会，与北京城里同样年龄的少年相比，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对于个人来说，不同的“位置”意味着社会经济与文化地位的不同，也将使他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对于人群与社会而言，“位置”的差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计的方式（经济形态）、人群的组合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与社会形态）乃至政治形态。

空间的第二个要素是“距离”。托布勒（Waldo Tobler）著名的“地理学第一定律”就是：“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互为相关，而相近的事物相互间的关联更为紧密。”距离导致了“核心”与“边缘”的差异。在师生交谈的集聚圈中，随意地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老师距离最近的往往是与老师关系最密切、对老师讲授内容最为关注的学生，而与老师距离越近，学生的密集程度也就越大；游离于这个集聚圈边缘的，往往是对这种谈话不感兴趣或不屑一顾的特立异行者。在另一方面，老师也倾向于喜欢那些靠近自己的学生，对他们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并希望通过他们影响全体学生。这样的阐释模式完全可以用于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察与分析。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那样：“核心区”集聚了区域范围内大部分的人口与财富，越靠近核心，其密度越大；它也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得到诸多的“优惠性”政策。边缘区域的人口密度较小，经济欠发达，财富总量低而且分散；政府控制薄弱，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出现另类化倾向。显然，“距离”是核心与边缘分异的基础。

距离的力量还不止于此。仔细观察我们假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的学生部分，可以发现：关系最好的同学可能有意无意地靠

在一起,而关系疏远的同学则自然而然地保持了彼此间的距离。反过来,在一个教室里,长期的同桌可能构成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坐在角落的那个同学可能与全班的所有同学都很疏远。这是距离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华北平原的集居村落里,村民之间的交流相对频繁,关系相对紧密,从而可能形成相对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同时,由于居住集中,官府也易于控制,国家权力对集居村落的渗透也就相对深入、广泛。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选择把自己的住房建在尽可能地靠近生存所依赖的水田、山林或湖泽旁,从而形成分散居住的状态,各农户之间的来往、交流与互相依靠均相对少一些,彼此之间相对疏远,其社会联结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则要复杂得多;官府控制散居村落的难度也较大。当然,“距离”的概念、界定与意义在今天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可能与同居一室的人形同陌路,而与远在天涯的人则亲如水乳,密若一体。这也是距离表现其力量与意义的一种方式。

空间的第三个要素是“方向”。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可以观察到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指向老师亦即中心的,大多数同学的目光集中在老师身上,是“集聚”的;在这个空间的边缘或某一部分,几位同学在窃窃私语,他们的目光和注意力相对于大多数集聚到老师身上的目光而言,是“离散”的。在大多数空间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集聚”和“离散”两种方向;物资的流动、人才的流动乃至权力的流动、文化的流动,也主要表现为这两种形式。当“集聚”式流动在一个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个空间表现为向心性集中的结构,中心密度最大,向外围依次表现为同心圆递减的模式;当“离散”式流动在一个空间中占据

主导地位时,这个空间表现为离散性扩张的结构,中心的控制力衰减,各部分向均质分布的方向演化,最终会导致空间的分离。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中,如果有一位同学非常有个人魅力,围绕着他的私语就可能会越来越大,形成一个“小圈子”;如果老师权威的制度性保障被消除,他们的这个小圈子就可能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空间”。我们在生活中,在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方向的流动。显然,“集聚”导致了诸种区域与社会的形成,而“离散”则带来了文化的传播、扩散与社会的变动。

如果说集聚与离散主要是内外、上下间的方向,是“纵向”的话,还有一种与之交叉的方向,我们不妨称作“横的方向”。在我们设想的这个师生空间里,每一位同学,都可能甚至是必然会偶尔向左右邻居瞄一眼,这种不经意的瞄一眼,使同学们自然而然地排成了半圆形的横排,从而形成一种有秩序的结构。如果每个同学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一点都不向相邻的同学看一眼,这个横排可能就不会形成。因此,“方向”是秩序与结构形成的基础之一。

位置、距离、方向是空间构成最基本的要素,三者又是互为前提的:一个人位置的界定有赖于他与其他人的距离和方向,距离是靠两个位置来确定并度量的,方向则取决于两个点之间的相对位置与距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空间的内在关联性。虽然在理论上任何空间内部都存在着关联性,但事实上,有些关联因为不具备真实的意义,它不足以将一些事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有意义的空间。比如:火车站广场上的陌生人群,对于这些人群而言,并不构成为“空间”,因为

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具有可供选择的意义。

在这里,我回避了空间的实质究竟是先验的架构,还是客观的实在,抑或建构的观念的讨论。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空间包含了这三个层次,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中,我们都不会去辨析也很难区分我们生活所依的空间究竟是先验的、客观的或者观念的,而是混合在一起的。显然,就我们个人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方法而言,关于空间的部分认知框架是先验的,至少是在我们知识体系与思想方法形成的过程中同时形成的;空间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自然的地理形式,还是人为的环境,都是客观的存在,也是无可置疑的;而可供表达的空间观念——位置的确定、距离的度量、方向的描述等,也都立基于社会的文化建构。当然,空间的物质基础在塑造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人类的活动与物质性空间相互结合运作而产生的各种新的空间建构也都具有非常大的力量¹,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给予的空间中,人类的社会历史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也在同时建构了人类的空间,并受制于这个被给予的和人类主动建构的空间,而且通过这种空间“表现”出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结构。这就是空间的力量。

从对空间及其力量的认识与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思考“空间”(或者说是“地理”)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以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为视角,阐述幅员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历史地缘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此种地缘结构对地区开发进程、经济格局之演变、文化区域的分合乃至国家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差异及多样性与中国历史的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十余年来,我逐步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

化的区域多样性”、“核心区”与“内地的边缘”、乡村居民的“集居与散居”、“统一、多元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等命题，初步形成了一些认识和具有自己特点的看法。这些思考与研究，可以界定为“空间维度下的历史”，也就是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结构，或者可以称为“历史研究中的地理学理路”。

二 “区域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强烈地感受到不同区域之间在自然环境、居住人口及其生产方式、居住方式、文化形态（特别是方言和习俗）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且不说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较大距离的区域差异（如大区之间或省际的差异），即便是在乡村旅游，我们也会发现，每隔二三十公里，生活方式、自然条件、聚落类型乃至田野形象和色彩全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村庄、每个乡镇、每个县都有属于自己的地域特征。这些地域特性早已渗透在平民百姓的心坎中，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随着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地区特性似乎正在逐渐消失，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地区发生的变化，都有别于邻近的其他地区，或者变化的方式各具特点，从而造成了界线分明的新差异。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开始思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问题。首先，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通过观察、感知而得以描述、展示并赋予其意义的，这种可以通过观察而认知并加以描述、展示的区域差异，可以概括为“景观多样性”，它主要

包括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以及景观认知与意义的多样性。而不同区域在景观方面的差异(景观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这不仅是因为“今日的”景观乃历史时期的遗存与积淀,更由于景观是人与环境的统一体,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过程的记忆与解释。因此,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生产生活方式的演进乃至政治模式、文化形态诸方面也会有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是造就“今日的”景观多样性的重要原因。这些差异,可概括为“历史进程与道路的多样性”,它主要表现在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三个方面;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即: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单一的轨迹,不同的区域都可能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不同区域在历史发展的出发点、走向与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等方面,都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即其所走过的道路根本不同,而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曲折或分歧。而不同区域所走过的、有着根本性不同的道路,则可称为“区域性道路”。²

迄今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抵都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均基本遵循一个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走过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有两种阐释路径:一是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阐释体系,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的演化,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自亦如此,中国各个地区亦概莫能外。这种思想方法假定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并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作为“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分析中。显然,这种阐

释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和未经证实的材料基础之上的，远远脱离了历史事实；其关于中国各地区历史发展走向的断言，更主要是出于先验的预设，主要是靠预设和臆测构拟历史，先定下框架，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中。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一阐释体系已失去了其赖以成立的方法论基础，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认为中国各地区均走过相同或相似历史道路、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与文化一致性的第二种阐释体系，则以“朝代更替”为核心线索，认为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变动，均与王朝的更替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假定各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与王朝的兴衰更替同步的，因而也就是相对一致的。这样，有关各地区的历史发展，就主要被叙述为王朝武力向各地区的扩张与征服，人口迁移带来了各地区的经济开发，然后是王朝制度在各地区的推行以及所谓“教化”的展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得到贯彻与展开，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遂得以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轨道中。“王朝更替”的叙述与阐释模式，掩盖了不同区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进程简单化了，因此已受到广泛的质疑，在很多领域实际上已经被摈弃了。

区域多样性的视角引导我努力突破这种单线式的思考方式，更着意于探究不同区域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纳入中华帝国体制内的根本性需求，分析这些区域自身的历史轨迹，理解其区域特性的形成及其与大一统帝国的一致性之间的差别与关联。质言之，即探寻不同区域自身的历史发展脉